

編者的話

從香港現況談到中梵協議一周年

本文提筆之日，香港剛剛完成了一次超前踴躍而整體上異常秩序井然的區議會選舉；令到這個經歷了多月不安日子的城市，感受到一絲絲久違了的祥和。盼望這份平安，可以開花結果，讓多個月以來疲累不堪的市民可以休息養生，更願望在一系列事件中受傷者，無論在身體上或心靈上，都能有機會得到治癒。

選舉本身是一種協商機制，以票數去表達意願及取捨。全城一同重視選舉，不管結果是否自己所屬意的，也反映了這協商機制的重要性。協商機制的優勝之處，在於避免了等到爆發火災後才去撲火。

2018年9月22日中梵之間的協議，本身也是一種協商之下的產物，至今已屆一週年，是時候初步檢算這次協商的得失。

教廷四十年來，自從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開始，經歷教宗本篤十六世，以至當今教宗方濟各，均一直尋求與中國政府方面達成共識，好使中國教會出現不正常問題時，能有協商的渠道以解決困難。

地下教會四十年來的確受苦很多，也很勇敢地應對。但將他們所受的困難算到習近平政府頭上，則與事實相去甚遠。

事實上，對地下教會的重重限制，四十年來一直如是，也特別值得我們佩服。筆者多次在不同場合演說時提到，地下教會並非站在政府的對立面，而是站在苦難的對立面，能夠迎難而處，這是國家所應該珍惜的公民情操。

讀者應該注意到，最近幾年一連串政府機關對教會的壓制，包括強求在聖堂內插國旗、張貼政策文件及宗教條例，禁止十八歲以下人士進堂、禁止夏令活動等等，對天主教會本身是一種不必要的專政及心理壓制。政府應明白到，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份，在法制上一直與各地的政府合作，但在禮儀及信理上面的教導，又肯定不是政治群體所能越俎代庖的。

緊隨中梵臨時協議簽訂之後，有香港的電視台在 2019 年初播出時事特輯，論及河北省保定教區蘇哲民主教的釋放問題；在特輯中可見蘇主教的姪兒蘇天佑曾說：「國家宗教[事務]局的中方代表，曾到保定來，我見過他。我問主教的事甚麼時候能解決，他說這是個國際問題。如果中國與梵蒂岡改善了關係，這事就能解決。」這一點引證了中梵關係在目前政治境況的切實需要。

當然，蘇天佑兄弟慨嘆的是，「現在關係既已改善，理應是解決問題的時候了。但到現在還沒有解決。」我們也和蘇兄弟同樣熱切盼望蘇哲民主教早日獲享自由。

一如筆者在過去兩年來多次提及，在中梵協議中所連帶要處理的七宗非法主教的寬免案，一宗是在江澤民時代發生的；其餘六宗是在胡錦濤時代發生的。習近平主席於 2013

年上任以來，再沒有在國內出現任何「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」，這是非常善意的表現，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。

當然，在過去五年中，「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」亦舉行不多，一共只有七次祝聖禮得到政府當局開「綠燈」：2015年有1次，2016年4次，2017及2018年卻一次也未有。2019年有2次。另外也有地下主教公開就職。

不可忽略的是，的確也有很多地下主教即使已經名滿天下，但地方政府當局依然不肯正視他們的主教身份，這包括曾長年擔任地下主教團秘書長的齊齊哈爾教區魏景儀主教。魏主教對於政府的消極取態，秉持著不強求又不放棄的灑脫胸懷，實在難能可貴；亦足讓今日中國社會中人人但求為己而無所不用其極者，用心反映一下。魏主教所接受傳媒的專訪，在《鼎》今期有全文轉載，讀者幸勿錯過。

目前可知的排在名單已得教宗批准的主教約有二十人，盼望他們能在中梵已有協議的實況下，早日得以祝聖為主教而能服務國內的廣大教友。

行文之日，又剛好是筆者臨屆退休之時，就過去三十五年來在聖神研究中心的生活，充滿感恩，滿載上主的祝福及護佑，當然也特別多謝三十五年來一直對我護守有嘉的上司湯漢樞機，以及與我通力合作的兩位英文版編輯，但亦不會忘記數十年來對我個人及《鼎》季刊全力支持的各位作者及讀者。願上主沛然祝福大家事事如意，承行主旨。

林瑞琪，2019年12月3日傳教士主保聖方濟沙勿略慶日
書於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